

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 (1926–1941)： 新界基礎教育的開拓者

方駿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

一九二六年，香港政府為發展新界的中文教育，為該地區的小學培養合格教師，成立了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這所二戰前新界地區的「最高學府」，與港島的官立漢文中學師範部 (1926–1940)、官立女子漢文師範學堂 (1920–1941) 及官立夜學院 (1935–1941, 1945–1950) 漢文師資班，為當時香港各區學校培養、培訓合格的漢文師資。自創立到一九四一年底因香港淪陷而被迫停辦為止，埔師前後一共招生十六屆，畢業學生十五屆。由於它實行嚴格的訓練和考核制度，學生素質相對較高，即使那些曾在埔師求學但未能領取畢業證書的學生，也深受新界鄉村學校的歡迎。埔師输出的畢業、肄業生，作為新界基礎教育的開荒牛，對該地區的教育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搜尋文獻資料的同時，訪問數位曾在埔師學習的現已年介耄耋的前輩教育工作者，盡量理清這所已經逐漸為人遺忘的早期師範學校的發展線索，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其教育實踐給現今香港教師教育的啟示。

前言

一九二六年三月，香港政府教育當局為了發展新界地區的基礎教育，為該地區培養合格的中文小學教師，成立了「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Tai Po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簡稱「埔師」。教育司任命高級視學官羅仁伯擔任該校的第一任校監 (一九二六年至三六年在任；三六年至四一年間由高級視學官尹耀聲擔任此職)，並以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

堂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Men, 1920–1926) 的第一屆 (1922年) 畢業生陳本照為校長。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新界地區的「最高學府」，埔師與港島的官立漢文中學師範部 (Normal Division of Vernacular Middle School, 1926–1940；前身為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官立女子漢文師範學堂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Women, 1920–1941) 及官立夜學院 (Evening Institute, 1935–1941, 1945–1950) 漢文師資班，為當時香港各區學校培養、培訓合格的漢文師資。自創立到一九四一年底因香港淪陷而被迫停辦為止，埔師前後一共招生十六屆，畢業學生十五屆、六十人，外加數倍於此的肄業生。由於它實行嚴格的訓練和考核制度，學生素質相對較高，即使那些曾在埔師求學但最終未能領取畢業證書 (教師文憑) 的學生，只要願意教書，也深受新界各區鄉村學校的歡迎。埔師輸出的畢業、肄業生，作為新界基礎教育的開荒牛，對該地區的教育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搜尋文獻資料的同時，訪問九位曾在埔師學習而現已年介七十七至八十八歲的前輩教育工作者，盡量理清這所已經逐漸為人遺忘的早期師範學校的發展線索，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其教育實踐給現今香港教師教育的啟示。

成立背景

埔師成立時，距中英兩國政府代表李鴻章 (1823–1901) 與竇納樂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1852–1915) 簽署租借新界予英國九十九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尚不足三十年。當時的新界，人煙稀少，社會經濟發展落後。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七日，港府發表十年一度的人口調查結果顯示：全港人口八十五萬多，其中在港島的約佔一半，九龍二十六萬多，蠶民六千九百人；面積佔香港全境九成左右的新界只有九萬六千多人，僅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 (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1998，頁445)。

與此相對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葉新界的新式學校教育極不發達。一九二六年，新界地區共有一百九十一間規模極小的漢文學校，

在學人數四千八百九十，平均每校二十五名學生；一九二七年，新界漢文學校總數一百八十五所，學生五千三百七十五，每校平均二十九人(Hong Kong Government, 1927, p. O4)。那時新界的兒童，失學情況嚴重。男童達八至九成，女童甚至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鄧承基，1973，頁30)。

新界新式學校教育的落後，一方面與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港英政府長期忽視中文教育有很大關係。香港教育的發展，可分為中、英兩個體系，後者在政府的扶持下，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建立了小學、中學及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而前者雖然一直是香港華人教育的主流，但所受的官方資助卻極為有限，大部分都是私人經辦。在重視英語及精英教育的政策指導下，港府對中文教育的支持和監管，在二十年代初只局限於下述幾方面：一，在補助制度及津貼辦法下，向一些由教會或團體經辦的中文學校提供小額資助；二，對新界部分私人開辦的鄉村學校，每年給予每位學生三元津貼；三，按照一九一三年教育法案，巡視依法在教育司署登記的私立學校(王賡武，1997，頁446-447)。

一九二二年初的香港海員罷工及爆發於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一方面給香港帶來強烈的社會經濟動盪和反英情緒(盧權等，1997，頁385-398；Chan Lau Kit-ching, 1990, pp. 195-197)，另一方面卻對香港中文教育產生一些正面的影響。總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 1875-1947；1925-1930年在任)意識到，離開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華人，香港不僅談不上繁榮，連生存都會受到嚴重威脅，若想保持本地政局的穩定，就不能排斥華人。為了緩和港府與華人的緊張關係，他打破歷來行政局不讓華人參與的傳統，委任商界名流周壽臣(1861-1959)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高岱、馮仲平，1994，頁144-145；Spurr, 1995, p. 156)。此外，港府對中文教育也採取了較以前積極的態度，予以一定的支持(吳倫霓霞、鄭赤琰，1989，頁171-172)。

要發展全港特別是新界的中文教育，解決師資短缺問題最為關鍵。埔師創辦前，香港已有兩所全日制漢文師範學校。一所是專門訓

練男教員的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簡稱「日師」。該校建於一九二零年，初設於荷李活道中華書院，一九二六年三月併入新成立的官立漢文中學 (Vernacular Middle School；後為紀念促成該校建立的金文泰而於一九五一年改名為金文泰中學)，成為其師範部，但亦有包括教育司署官員在內的不少人繼續以「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稱之。一九三九年香港師資學院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羅富國教育學院前身) 成立後，該校 (即師範部) 於一九四零年七月在送走最後一屆畢業生時停止運作。二十年間，日師總共輸出了一百一十名畢業生 (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頁11-12, 26；Director of Education, 1939, p. O14)。

另一所漢文師範學校是官立女子漢文師範學堂，簡稱「女師」，這是香港歷史上僅有的一所專門培養女教員的師訓學校。該校亦建於一九二零年，設於庇里羅士女校。香港師資學院成立後，該校於一九四一年七月最後一屆學生畢業時停辦。在其存在的二十一年時間裏，女師一直由香港科技專科學校 (Hong Kong Technical Institute) 師資班第一屆 (1916年) 畢業生陳逸馨女士擔任校長，總共培養了二百零二名合格教師 (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頁13-16, 26；Director of Education, 1939, p. O14)。

此外，成立於一九零七年的香港科技專科學校在皇仁書院內開設漢文師資班 (Vernacular Teachers' Class)，培訓在職的非合格教師。該校因是夜間上課，俗稱「夜師」，一九三五年正式改稱官立夜學院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5, p. O24; Ng Lun Ngai-ha, 1984, pp. 115-116)。夜師師資班的課程為期三年，畢業生的資格受政府認可 (阮柔，1948，頁88；Hong Kong Government, 1938, p. 111)。夜師在日治時期被迫停辦，戰後重新開辦，直到一九五零年。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五零年期間，夜師漢文師資班總共培訓了四百五十五名在職教師 (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頁16-22)。

至於英文學校師資的培養，則由一九一七年建立、一九四一年因戰火被迫關閉的香港大學文學院的師訓系 (Department for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Faculty of Art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一九五一年港大文學院重新建立的教育系及一九七六年脫離文學院而獨立設置的教育

學院的前身)和香港科技專科學校的英文師資班(English Teachers' Class)負責。前者重點培養職前教師，後者則訓練非合格的在職教師(Sweeting, 1998a, p. 4; 1998b, p. 2; 1999, p. 7;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8, p. 111)。

然而，「日師」、「女師」、「夜師」、港大師訓系這些位於港島的師訓機構所培養出來的畢業生沒人願意到當時生活條件艱苦的新界農村。據已故「新界學」權威邱東回憶，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新界鄉村仍然過著「半原始生活」：鄉民們住的通常是祖先遺留的舊屋，四周多數無窗，惟有靠天井流通空氣；照明一般都用火水燈，光線昏暗；吃的則主要是鹹魚青菜，豬肉極少(邱東，1992，頁153-155)。一九七三年，埔師前校長陳本照回憶四十多年前的新界情形時，有這樣的描述：「昔余任職埔師之初，因事由九龍返大埔，偶在冬之夜，寒月不在天，火車抵沙田，車廂外望，四野如漆，車站、茶寮、豆燈三兩，熒熒如鬼火；荃灣產馬錢(草)，多瘡病，羈旅視為畏途；瘡疾亦常見於大埔，同學每以為苦；余亦曾患嚴重之毒蚊症」(陳本照，1973，頁5)。當時民間的說法是，大帽山遍野生長的馬錢草含有毒素，滲入地下後會導致附近飲用山水或井水的鄉民身體羸弱，加之山中蚊多，居民易得瘡疾或黃腳病(羅澤棠，2000)。在這種情況之下，要解決新界教師嚴重不足的問題，惟有靠自己培養了。一九二四年，時任新界視學官、旋於同年轉任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校長(1924-26年在任)的黃國芳(1903-83)，建議政府在新界設立一所師資訓練學校。在省港大罷工事件的催化下，埔師於一九二六年三月正式成立(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頁26-27)。

校舍

埔師在其開辦的十六年裏，校址三變，一直租用民房為校舍，沒有屬於自己的固定校園。學校剛創立的時候，校舍在大埔仁興街五十三至五十五號。第二年(1927)租用北盛街五至七號作為課室，改仁興街校舍為師生宿舍。一九三三年，學校全部遷至錦山漢家路(近鐵路山坡

表一 埔師的校舍

年份	校址
1926-27	大埔仁興街五十三、五十五號
1927-33	大埔北盛街五、七號；仁興街五十三、五十五號
1933-41	大埔錦山漢家路(近鐵路山坡處)

處)，租用那裡朝北方向的六座大樓中的最左邊兩座。一九三五年，埔師再租用右鄰大樓的上層(見表一)。此三處的地址仍在，但原有房屋今已不存(陳本照，1973，頁5)。

埔師的三個校舍規模都很小，設備也極簡陋，沒有運動場地，更談不上農林園圃(Education Department, 1939, p. O14)。錦山校舍只有一間乒乓室和一間八成是校長陳本照私人藏書的圖書室。師生的教學活動、學習空間狹小。樓下是教室，樓上則是師生宿舍(巫文彬，2000)。即使用當時的標準來衡量，也遠非理想。

教育當局也意識到為埔師另建一所合適師訓校舍的必要。一九三九年，教育司署正式提出在上水吳屋村為埔師興建永久校舍的計劃：除教室外，還備有師生宿舍、運動場地等。可惜這一藍圖後因二戰爆發而成泡影(陳本照，1973，頁5；Education Department, 1939, p. O14)。

師資

埔師前後一共有七位男性講師。這跟學生全是男生有關，也跟當時極少新界女性接受較高程度的教育有聯繫。這七位導師並非同時在埔師任教——通常的情況是，同一時間學校只有包括校長在內的兩至三位教師。早期幾屆，埔師只有校長陳本照和導師陳袞兩人。其中陳袞擔任師一和師二兩級的班主任，陳本照兼任師三班主任(文伯恒，2000；Hong Kong Government, 1926-1935)。

埔師校長一直由陳本照擔任，他也是唯一的一位自始至終在該校任教的導師。陳氏一九二二年畢業於官立男子師範學堂，曾從港大中文系的開山鼻祖名儒區大典研習漢學，並完成漢文師範深造班(Hong

Kong Government, 1926, p. O26；王齊樂，1996，頁292-293)。在埔師，他主要教授國文和經學。在學生心目中，他是一位要求嚴格、但待人親切的良師(謝聖明，2000)。

陳袞先生也曾經在官立男子師範學堂求學，是男師第三屆(1924年)畢業生(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頁11)。在埔師，他除教授國文、算術外，還兼授教育學、教學法和學校管理。他的教育理念在他三十多年後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略窺一斑。他認為，學生應該德智體三育全面發展，而促使他們在這三方面發展的原則有七：「不是外在的他力塑造，而是內在的感染同化；不可從外向內塞入，而要自內向外吸收；不強作單方的灌輸，而務求多方的啟發；不看重知識的授予，而注意本能之擴展；不計較現在之收受，而著眼將來之自獲；不鼓勵逞鋒於搶先，而引導蓄勁以持後；不企望其儘早秀發，而關切其根本是否穩厚」(陳袞，1973，頁22)。

因為教師人數有限，加上課程難度不算艱深，所以埔師導師的科目分工並不明顯，往往一人要教幾個科目。這可以從表二看出。據部分埔師舊生回憶，這七位導師所任教的科目如下：

表二 埔師的導師及其任教科目

姓名	任教科目
陳本照校長	國文、經學(儒家經典)
陳袞先生	算術、國文、教育學、教學法、學校管理
羅慕陶先生	教學法、歷史、地理
林紹光先生	生理衛生
鄺耀普先生	地理、算術、勞作
周乃聰先生	體育
陳少儒先生	農科

資料來源：埔師同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1973)；文伯恆(2000)；李其彬(2000)；巫文彬(2000)；張枝繁(2000)；張雲(1999-2000)；羅澤棠(2000)；謝聖明(2000)。

學生

埔師的學生全是男生。新界地區的傳統私塾，學童多男性，女校數量

極少。二十世紀初，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在荃灣舊墟設立一個名為全完書室 (Chuen Yuen Study Hall) 的識字班，專收十二歲以上的男女學童，開創了新界女子教育的先河。此後一九一二年開設的一所小規模上水女子學校及一九一五年創辦的元朗南邊圍的真光女校 (True Light Girls' School)，都為推動新界女子教育作出了不少貢獻 (何慧儀、游子安，1996，頁46)。但總體來講，新界女子入讀正式學校的仍然很少，適齡女童的失學率極高 (鄧承基，1973，頁30)，專門在新界設立類似官立漢文女子師範學堂的師訓學校的迫切性顯得不足。

埔師多數學生只有小學畢業程度，有時小學未畢業的都可以入學。這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整個新界沒有一所中學——新界第一所中學元朗公立中學創立於一九四九年 (元朗公立中學，1980，頁1；陳蔭彭，1986，頁130)。由於早期鄉村學校規模很小，設備簡陋，教師多數「一腳踢」 (邱東，1992，頁177-178)，雖然教育當局在一九二九年對學校課程有所規定，但大部分學校無法做到，所以學校私塾成分仍然較濃，偏重文史。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在入讀埔師時通常已具備一定的文史知識水平。如一九三六年進入埔師的張枝繁先生，小學畢業時，不僅能背誦《千字文》、《三字經》、《五字文》、《增廣賢文》等蒙學讀物，而且還熟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 (張枝繁，2000)。學生無論其入學前的受訓背景如何，只要通過埔師的入學試，就可以入讀，因此同學間的年齡參差較大 (黃茂芬，2000；謝聖明，2000)。

因為埔師的建校宗旨是為新界學校培養合格中文教師，所以學校所收的學生，基本上是新界的青少年，偶爾也有來自中國大陸鄰近地區如深圳的學生。本港的學生畢業後，一定要在新界學校任教 (陳本照，1973，頁5；Hong Kong Government, 1939, p. O14)。

埔師的訓練及升學要求均很嚴格，入學後並不等於每年可以自動升班。學生若考試不合格，就得留級重讀，直到考試合格為止。升級的人數逐年減少，三個年級的學生人數呈金字塔形。正因為如此，埔師學生有的要四至六年才能畢業，甚至不能畢業 (張雲，1999-2000；

李其彬，2000)。凡不能通過由教育司署考試委員會主持的畢業試的師三學生，均不得畢業。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一年，入讀埔師的學生共有十六屆，其中十五屆畢業。歷屆及格畢業的，少則一人，多不過八人，十五屆總共畢業六十人(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頁23-24；巫文彬，2000)。詳情見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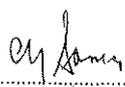
表三 埔師歷年在學及畢業人數

年份	最高錄取額	平均在學人數	成功畢業人數
1926	30	24	0
1927	59	42	2
1928	34	27	4
1929	37	31	5
1930	36	31	3
1931	35	26	3
1932	36	30	1
1933	45	37	8
1934	41	29	5
1935	42	39	5
1936	44	40	4
1937	43	38	4
1938	47	35	3
1939	不詳	不詳	4
1940	不詳	不詳	5
1941	不詳	不詳	4
總共	應超過600	應超過500	60

資料來源：Hong Kong Government (1926-1939)；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巫文彬(2000)。

由於埔師規章制度嚴格，學生學習質量有保證，「是以埔師同學，在戰後津貼學校教師之銓敘，即使離校而屬師二，亦得列入甲級」(陳本照，1973，頁4)。甲乙級教師的劃分，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所謂甲級教師，即受過政府認可的正式師範訓練的教師，而乙級教師則是那些未受過港府認可的師範訓練的教師。埔師畢業生一入職即可成為甲級教師，而那些未能順利畢業者在校任教一段時日後也能轉入甲級(張雲，1999-2000；羅澤棠，2000)。

圖一 埔師第十二屆畢業生陳瑞文的畢業證書

 G. R.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TAIPO <hr/> Teacher's Certificate <hr/> </p> <p>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i>Chuan Sun Wen</i> has completed his course at this school and has satisfied the examiners in all the subjects prescribed. </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Director of Education. </p> <p> EDUCATION DEPARTMENT, <i>February, 8th 1939.</i> <i>陳木照</i> </p>	<p> 教育司 發給畢業證書事照得香港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 學生(修業期)滿考驗成績及格應予畢業合就發給證 書為據此證 </p> <p> 右給畢業生 <i>陳瑞文</i> </p> <p> 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二月八日 </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為</p>

學習生活

埔師為家居遠離學校的學生提供宿舍，費用全免。宿舍就在課室的上面。在校住宿者「起居藏修有定時，夜自修則肅然寂靜，清晨早讀，雖在嚴寒，甫平明而書聲徹四野。至宿生書本、被席、巾，以至一筆之微，必整肅如序」（陳本照，1973，頁5）。校長陳本照先生亦住在學校，他親自擔任宿監，早晚巡視住校生的晨讀和晚自修情況。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住校生可以回家過週末，但星期天的晚上一定要返回學校進行晚自修，所以實際上住校生每週只可以有一晚在自己家裏度過。在這樣的管理之下，學校的學風非常「嚴謹、純樸無華」（黃茂芬，2000；謝聖明，2000），多次受到政府漢文視學官的讚賞（Hong Kong Government, 1928, p. O22）。

因為在校居住，所以學生跟導師接觸的時間較多，師生關係較好：「十餘年間，同學固不易有不愉之色，為師亦未見有疾厲之辭，師友之間，如父兄群其賢子弟」（陳本照，1973，頁4）。導師平時不但教授專科知識，更能進行身教，言教與身教真正統一。

學生自己組織膳食委員會，聘請廚師為他們準備飯菜。膳食費用學生自付，每月大約三至四元。但仍然有家住大埔甚至粉嶺、上水的同學因家境困難而選擇回家吃飯，或步行或騎車，風雨無阻（張雲，1999-2000；謝聖明，2000）。

由於學校的各項設備簡陋，埔師的校園生活相對比較單調。學校搬至錦山後，平時學生的主要體育活動是打乒乓球和排球，課餘閱讀的去處則是校長陳本照管理的小型圖書室，春夏季時會組織若干次野炊。儘管條件較差，但大家都很珍惜在這所當時新界的「最高學府」學習的機會（巫文彬，2000；Hong Kong Government, 1933, p. O22）。

課程

埔師學制除第一屆 (1926-28) 為兩年外，其餘皆為三年制。延長學制一

年的原因是學校發現接受兩年師訓的學生水平偏低，不足以勝任鄉村小學的教學工作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9, p. O14)。

學習科目方面，除師範科外，還有國文、作文、經學（儒家經典）、算術、歷史、地理、生理衛生、園藝等科。生理衛生、園藝科導師多請大埔醫局醫生和園林局官員等非學校正式導師擔任（陳本照，1973，頁5），體育、勞作等科初辦時沒有，三十年代起因應中文課程委員會訂定的《中小學課程標準》而增設，教師有時也是邀請外面有識之士擔任（謝聖明，2000；Education Department, 1939, p. O14）。一九二九年港府頒佈《中小學課程標準》，要求公立學校依例施行。小學課程包括國文、算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衛生、英文、體操、音樂、藝術等科（吳倫霓霞、鄭赤琰，1989，頁177-178）。

埔師重視國文、經典。國文主要講《春秋》、《左傳》，經學則重點講《論語》、《孟子》，由校長陳本照親授（陳本照，1973，頁5）。這樣的偏重同陳本照的教育背景、教育理念及訓練有一定的關係。陳氏本人在文史方面的學養深厚，曾節衣縮食購置由上海中華書局於一九二四年至三一年間出版的全套《四部備要》（七十年代贈給香港中文大學）（巫文彬，1973，頁25-28；羅澤棠，2000）。他認為《論語》為「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衿」（陳本照，1973，頁5）。一九二七年，政府漢文視學官在其年度報告中，認為埔師學生的漢學功底略勝港島的「日師」、「女師」學生一籌（Hong Kong Government, 1927, p. O24）。

一九二九年的《中小學課程標準》規定小學開設英文課，但由於早期的香港教育當局，重視市區學校的英文教育，對新界鄉村學校採取基本上放棄的政策，不作特別的要求（王廣武，1997，頁422），所以當時新界的小學一般均不開設英文課，埔師也不教授英文。

埔師的記分規定是，各科以一百分為滿分，五十分合格，凡列為考試的科目，必須總平均分合格。因埔師素來重視中文，所以作文一科，不可用其他科目的分數補救，必須合格，才能升級或畢業（巫文彬，2000；李其彬，2000）。師一考散文一篇，師二考散文、信札各一篇，師三畢業試，考散文、信札、史論各一篇（巫文彬，2000）。

學生的課本主要購自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有關書籍，導師開出書名後，學生自費購買(張雲，1999-2000)。

由於埔師的學生要去鄉村小學任教，具備基本的農業知識是必要的，所以埔師學生除了學習農科書本知識外，還要進行農場實習。錦山時期的埔師，實習農場地址在今春暉園(恩主教書院附近)，離校舍約二十分鐘步行路程。教師有時將學生帶到農場，面對實物進行授課。主要的則是學生課餘輪流到此地澆花種菜、施肥除草，在照看農場的同時，增加自身的農業知識(李其彬，2000)。

埔師的師二師三學生要進行教學實習。實習地點是大埔附近的小學。與現行香港的師訓院校的通常做法不同，埔師的實習並不是學生整段時間(如一學年外出實習一至二個月)，而是學習中抽一些時間去實習學校試教，一週一堂(文伯恆，2000)。通常是一位老師帶幾個學生去一所學校，看他們實習，並進行記錄，回校後再進行講評分析(文伯恆，2000；謝聖明，2000)。師三畢業試中，有教學實習一科。由教育司署派一位高級視學官(考試委員會成員之一)親臨埔師課室，考察學生的教學表現(如一九三九年由高級視學官兼埔師校監尹耀聲擔任)，並記錄評分。事先邀請大埔一間小學的六年級學生三十人左右，來埔師教室上課，由師三參加畢業試的學生輪流試講，題目由該監考官臨時指定，考生無法事先準備，只有依照教師平時所授的教學法，隨機應變教課(巫文彬，2000；張枝繁，2000)。

學生師一師二時的考試，由學校自己主持。但師三畢業試，則由教育司署統一出卷、改卷，埔師導師不參加，試卷收齊後封好交人帶回教育司署(文伯恆，2000)。經教育當局考試合格後，准予畢業，並介紹到新界鄉村各校任教(鄧承基，1973，頁31)。事實上，因為埔師每年只有極少學生畢業，遠遠滿足不了新界各區小學的需要，埔師不少學生在畢業前已有鄉村學校通過熟人預約(謝聖明，2000)。不僅拿到教育署和埔師聯合頒發的教師文憑(Teacher's Certificate)的畢業生人人受聘，就連那些未能順利畢業的學生，只要想教書，也同樣能夠謀到教職，而且極少有人需要去西貢、沙頭角和大嶼山等相對更加偏遠的地區任教(黃茂芬，2000；羅澤棠，2000)。

埔師對新界教育、社會的貢獻

埔師在其開辦的十六年中，總共培養了六十名畢業生和數倍於此的肄業生。他們在新界各區學校就業，成為新界基礎教育的開荒牛，筭路藍縷，為該地區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埔師同學會會刊》，簡介了四十四位埔師畢業生，這之中，曾經擔任或當時正在擔任校長的有二十六人，接近六成。除一人後來轉往港島任教外，其餘四十三位全部在新界各區學校任教(李其彬，1973，頁60-64)。

埔師畢業肄業的同學中，不少卓有成就，這裏僅列舉數位。一九三九年畢業生張枝繁先生(1920-)，自離開學校後，一直在新界博文學校任教，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八零年退休，長期擔任該校校長。張氏還先後擔任新界多所學校的校董、校監，八十歲高齡時，仍擔任埔師紀念學校校監及崇德學校、大埔舊墟學校和大埔公立學校等校的名譽校董，佛教大光中學校董會主席。社會服務方面，曾擔任新界學界體育協會、大埔文藝協進會、林村鄉公所主席以及新界地域童軍總監等職十多年(張枝繁，2000)。

張雲先生(1924-)，一九三九至四一年就讀於埔師，因日本侵佔香港而被迫停學。一九四九年自戰後創辦的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Rural Training College, 1946-54)畢業後，長期在大埔汀角路的明德學校任教，直到退休。張氏在執教之餘，潛心畫藝，師從著名國畫大師趙少昂(1905-1998)，西洋畫和國畫的造詣均很深厚。自一九六六至九七年，先後舉辦十次個人畫展，其中六次在港以外，包括一九八三年在瑞典、一九八四年在倫敦、一九八五年在紐約、一九八九年在英國雪埠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一九九四年在曼徹斯特、一九九五在深圳舉行。出版畫集三本，計有《張雲書畫集》(1982)、《張雲速寫集》(1984)、《張雲畫集》(1997)。現任埔師同學會會長。

另外，第八屆畢業生彭富華曾任新界鄉議局第十七屆主席(1966-68)(新界鄉議局，1996，頁5；劉潤和，1999，頁67)，第二屆畢業生陳有才曾任鄉議局第十八(1968-70)、第十九(1970-72)、第二十

(1972-74) 屆副主席(新界鄉議局, 1986, 頁45, 49)。陳有才先生還歷任新界學界體育協進會會長、北區區議會非官守議員、打鼓嶺鄉事委員會主席、上水育賢學校校監、打鼓嶺昇平學校校監、打鼓嶺坪洋學校校監等職(新界鄉議局, 1986, 頁10)。

埔師舊生還積極創辦了大埔師範學校紀念學校(Tai Po Normal School Memorial School)。他們於一九五八年提出此建議, 從此開始籌備經費。很多埔師校友捐款一千元, 這在當時相當於他們數月的薪水(埔師同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 1973, 頁52)。一九六一年位於大埔錦山的紀念學校順利建成, 其建校經費一半由政府出資, 另一半由埔師同學籌得。紀念學校初期為上下午班學校, 共有十二班, 一九九七年開始改為全日制小學(大埔師範紀念學校, 1999)。

埔師教育實踐給我們的啟示

雖然埔師規模很小, 只辦了十六年, 而且停辦了近六十年, 但它仍有一些做法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借鑑:

一、寬入嚴出

埔師實行三年制, 全校僅設三班(每級一班), 加起來全部人數不足一百。由於學校考試嚴格, 不少學生不能順利升級或畢業, 所以埔師十五屆畢業學生中, 只有六十位畢業, 平均每屆四人。大約每十名入讀埔師的學生中, 最終一名得到教師證書。這樣的結果, 也許並不是最理想的, 但嚴格要求及進行質量把關, 實是好事。埔師在這一方面的做法, 值得現今包括師訓機構在內普遍實行嚴進寬出的大專院校借鑑。

二、豁免學費

埔師學生讀書不用繳交學費, 住宿不用付宿費, 惟需自付在校膳費。這種經濟上的支持, 對當時絕大多數新界學生來講, 有很大的吸引力。這個良好的做法, 源於香港第一所師訓機構——政府師範學堂

(Government Normal School, 1881–1883)，並為後來包括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在內的多所師範院校繼承和發展。鄉師不但不收學費，而且還給就學者優厚的生活津貼(方駿，1999，頁8)。可惜這些有助於吸收家境貧寒的優秀學生的做法，在一九六五年被港府取消(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1998，頁782)，從此以後，師範生不但沒有生活津貼，還要繳交大量學費。依筆者看，這是導致師訓院校招收不到頂尖人才的諸種原因之一。

三、讀書風氣濃厚

埔師的學習條件即使用當時的標準來衡量，也不理想，不但活動空間狹小，沒有運動場地，也缺乏像樣的圖書館。但學生們晚上都安靜地在課室裏進行晚自修，清晨上課前則高聲朗讀課文，學習風氣良好。反觀現在，許多學校有一流的教學設施，不少學生卻很少充分利用。除了期末考試、交功課那段時間，相當多的學生平時一放學就匆匆離校，極少流連藏書豐富、寬敞舒適的圖書館。自掏荷包、定期買書的學生也愈來愈少。這種令人遺憾的情況，值得廣大的教育界人士深思。

四、講究文史基本功

埔師的課程重視文史，學生在這方面基礎紮實。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埔師同學會會刊》，輯錄了部分畢業生所寫的幾十首詩詞，其中不少有一定的文學功底。茲舉兩首為例。廖爵榮的〈潭江晚眺〉：「炊煙縷縷出堤東，暮靄蒼茫入釣蓬；寂寂潭江潮漸長，歸帆來染夕陽紅」；鄧德欽的〈雨夜〉：「春風吹幔入山樓，午夜蕉聲雨未休；欄外落紅知幾許，有人掩卷替花愁」(埔師同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1973，頁45–46)。另外，埔師學生每晚都要寫一頁中小楷的毛筆字，並由校長陳本照親筆批改。埔師張雲先生時隔六十年，至今仍然保存著當年的書法練習簿(張雲，2000)。幾位賜函本文作者的埔師舊生，不僅普遍文筆流暢、遣詞

典雅，而且書法清秀。相比之下，現今的師範生，在板書及硬筆書法方面很少下功夫，寫出的字常常令人汗顏，而且板書時筆順也每每寫錯。雖說如今是信息時代，教師可以借助電腦來輔助教學，但必要的板書仍然需要，而且替學生改簿的評語，必不可少，這些都要教師手書，字寫得像鬼畫符的老師如何能贏得學生的尊敬與佩服呢？

鳴謝

本研究得到香港教育學院研究基金的部分支持。在寫作過程中，作者有幸親自或電話採訪埔師歷屆畢業生文伯恆、李其彬、巫文彬、張雲、張枝繁、黃茂芬、謝聖明諸位老先生，並蒙李其彬、巫文彬、陳瑞文、謝聖明、張雲、羅澤棠等惠賜信函，得到許多寶貴資料。另外，兩位評閱人的意見也很有啟發性，在此一併致謝。文中一切疏誤由作者自負。

訪問和通信

文伯恆(2000)。二零零零年四月三日電話訪問埔師一九三六年畢業生文伯恆先生(1917-)。

巫文彬(2000)。二零零零年五月五日電話訪問埔師一九三八年畢業生巫文彬先生；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巫氏親筆信。

李其彬(2000)。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電話訪問埔師一九四一年畢業生李其彬先生；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二日李氏親筆信。

張枝繁(2000)。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二日、六月一日訪問埔師一九三九年畢業生張枝繁先生。

張雲(1999-2000)。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二日、六月一日訪問一九三九至四一年在埔師就讀的張雲先生。

陳瑞文(2000)。埔師一九三九年畢業生陳瑞文先生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九日親筆信。

黃茂芬(2000)。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二日訪問埔師第一屆學生黃茂芬先生(1913-)。

謝聖明(2000)。二零零零年四月三日、五月五日電話訪問埔師一九四零年畢

業生謝聖明先生(1923-)；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三日及五月十五日謝氏兩封親筆信。

羅澤棠(2000)。埔師一九四零年畢業生羅澤棠先生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九日親筆信。

參考文獻

- 大埔師範紀念學校(1999)。《大埔師範紀念學校》。香港：大埔師範紀念學校。
- 王齊樂(1996)。《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
- 王廣武主編(1997)。《香港史新編》(下)。香港：三聯書店。
- 方美賢(1975)。《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842-1941》。香港：中國學社。
- 方駿(1999)。〈鄉村師範專科學校(1946-54)：香港教師教育史上的重要一頁〉。《基礎教育學報》，第九卷第一期，頁1-19。
- 元朗公立中學(1980)。《元朗公立中學建校卅週年暨校友會成立廿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元朗公立中學。
- 阮柔(1948)。《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
- 吳倫霓霞、鄭赤琰(1989)。〈香港華文教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載鄭赤琰、吳倫霓霞編，《兩次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169-185)。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何惠儀、游子安(1996)。《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香港：區域市政局。
- 巫文彬(1973)。〈贈書〉。載埔師同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編，《埔師同學會會刊》(頁25-28)。香港：大埔師範同學會有限公司。
- 李其彬輯錄(1973)。〈埔師同學簡介〉。載埔師同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編，《埔師同學會會刊》(頁60-64)。香港：大埔師範同學會有限公司。
- 邱東(1992)。《新界風物與民情》。香港：三聯書店。
- 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編(1971)。《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第三屆藝文展覽會專刊》。香港：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
- 高岱、馮仲平編(1994)。《從佻倻乍到彭定康：歷屆港督傳略》。香港：新天出版社。
- 梁誠立、陳英倫編(1938)。《香港官立漢文師範同學錄》。香港：香港青年生活社。

- 埔師同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編(1973)。《埔師同學會會刊》。香港：大埔師範同學會有限公司。
- 陸鴻基(1989)。〈一九三〇年代香港教育概論〉。載鄭赤琰、吳倫霓霞編，《兩次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187-20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陳本照(1973)。〈隨筆憶埔師〉。載埔師同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編，《埔師同學會會刊》(頁4-5)。香港：大埔師範同學會有限公司。
- 陳袞(1973)。〈小學教育的原則〉。載埔師同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編，《埔師同學會會刊》(頁21-22)。香港：大埔師範同學會有限公司。
- 陳蔭彭(1986)。〈略談新界教育的發展〉。載新界鄉議局(1986)，《新界鄉議局成立六十週年慶典特刊》(頁130)。香港：新界鄉議局。
- 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主編(1998)。《香港6000年》。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
- 新界鄉議局(1986)。《新界鄉議局成立六十週年慶典特刊》。香港：新界鄉議局。
- 新界鄉議局(1996)。《新界鄉議局成立七十周年紀念(1926-1996)》。香港：新界鄉議局。
- 劉潤和(1999)。《新界簡史》。香港：三聯書店。
- 鄧承基(1973)。〈四十多年來我所見新界教育的面貌〉。載埔師同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編，《埔師同學會會刊》(頁29-31)。香港：大埔師範同學會有限公司。
- 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香港漢文師範畢業同學錄》。香港：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
- 鄭宇碩編(1983)。《變遷中的新界》。香港：大學出版印務公司。
- 盧權等(1997)。《省港大罷工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羅富國教育學院歷史編輯委員會(1989)。《羅師五十年1939-1989》。香港：羅富國教育學院。
- Chan Lau Kit-ching (1990).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Director of Education (1939).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Education Department (1939). *Annual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39*.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26-39).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8). *Annual repor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1938*. London: H.M. Stationary Office.
- Ng Lun Ngai-ha (1984).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Spurr, Russell (1995). *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FormAsia.
- Sweeting, Anthony (1990).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0: Facts and opin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Sweeting, Anthony (1998a). Teacher education at Hongkong University: A brief history (Part 1: 1917–1951), *Curriculum Forum*, 7(2), 1–44.
- Sweeting, Anthony (1998b). Teacher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brief history (Part 2: 1951–Circa 1976), *Curriculum Forum*, 8(1), 1–32.
- Sweeting, Anthony (1999). Teacher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brief history (Part 3: Circa 1976–Circa 1998), *Curriculum Forum*, 9(1), 1–44.

Tai Po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1926–1941): The Pioneer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FANG Jun

Abstract

The Tai Po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TVNS) was established in 1926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train qualified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for the then backward New Territories. Together with the Normal Division of the Vernacular Middle School (1926–40) and the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Women (1920–1941) as well as the Vernacular Teachers' Classes of the Evening Institute (1935–1941, 1945–1950) in the Hong Kong Island, the four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es supplied the majority of qualified Chinese teachers in Hong Kong prior to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he territory in December 1941. A total of 15 classes graduated from the TVNS during its 16 years' existence. Practically all of the graduates and those who once studied and finally left the school without teacher's certificates, assumed teaching position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consequently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region. This paper, using documentary sources and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interviews with some of the TVNS alumni aged between 77 to 88, 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this early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e and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and experiences we can gain from the school's educational practice.